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侯悦婷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关键词:汉武帝;皇权;政治;巫蛊;外戚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7)04-0045-08

巫蛊,起源久矣,是加害仇敌的一种巫术。巫蛊形式多样,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境况,可以施行不同的巫术,达到以期效果。汉武帝崇信神仙方术,在位期间巫风极盛,以巫蛊引起的宫廷政变层出不穷。汉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作为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间的权力斗争,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以巫蛊术入手分析巫蛊之祸前后时代背景、时局变化,对探究武帝皇权政治与思想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于巫蛊,前人已有不少成果。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从巫蛊的制作、种类、辨识、破解、刑律方面分析了巫蛊的文化与心理处境^[1];李零《中国方术考》从占卜、帛书、炼丹等方面阐述了数术方技与古代思想^[2];宋兆麟《术与巫术》^[3]、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4]等专著,对巫的源流、信仰、施行方法进行了探讨;王子今《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就巫蛊之祸以及相关的礼俗现象对认识社会史、文化史与政治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析^[5];方诗铭《西汉武帝晚期的“巫蛊之祸”及其前后——兼论玉门汉简汉武帝遗诏》就巫蛊之祸爆发的原因:李氏集团发动打击卫氏集团的阴谋活动做了重点探讨^[6];台湾学者蒲慕洲《巫蛊

之祸的政治意义》^[7]、徐卫民《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8]等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征和二年巫蛊之祸发生的背景、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元光二年和征和三年的巫蛊之祸学界关注不多,未有专门论述。关于皇权,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对皇权主义核心价值的初步型构、皇权主义普遍规范的逐步确立、皇权主义基本模式的复杂塑造、皇权主义本质精神和直观体现等方面进行了综述研究^[9];朱子彦《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对九锡与禅让制度、皇权与朋党、铁券与赐死等不同时期的制度做了剖析论证^[10];台湾学者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11]、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12]等专著,对汉代皇权的运作特点,汉代思想文化对皇权的作用等做了深入探讨;此外宁可、蒋福亚《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与忠君观念》^[13]、李治安《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复合建构》^[14]、王瑞来《再论皇权》^[15]、栾保群《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16]等论文,将皇权与官僚政治,皇权与社会思想,皇权与外戚相结合予以分析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然未有以巫术为视角研究皇权的。

收稿日期:2017-05-25

作者简介:侯悦婷(1991—),女,陕西宝鸡人,硕士生,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汉武帝皇权政治,学者大多从中朝官的设立、盐铁专卖、独尊儒术、表彰六经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缜密的剖析,而就巫蛊对于皇权的作用,特别是对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之间的联系,巫蛊与皇权的关系,以及武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态度关注不多。本文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从武帝时期三次巫蛊案入手,分析巫蛊术与皇权政治的关系,以期获得新的认识和突破。

一、皇权与巫术

皇权,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命题,伴随着皇帝制度的产生孕育而生。秦王政一统天下后,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自称为皇帝,由此皇帝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帅存在了2132年(公元前221年—1911年)。从秦代皇权的产生到明清皇权的极盛,历代皇帝为皇权的巩固做出了前赴后继的努力,采取多种措施以维护并完善自己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至上权力。常态下的皇权一般来说,首先建立一套听命于己的官僚体系;秦汉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两宋的二府三司,元代行省制度,明清的内阁与六部。此外配套相应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文化思想教化、监察法律措施、经济土地政策等。从总体来看,皇权不断强化,官僚权力逐渐弱化。最能体现这点的是丞相,作为官僚体系中的百官之首,从秦汉时期地位尊贵甚至皇帝也要以礼相待到隋唐两宋相权分割,最后明清废除丞相,事归台阁。其次,在宫室、舆服、宗庙、陵寝、出巡、封禅、立储、赐爵、大赦等方面形成礼仪规范。比如皇帝的墓称为陵,皇帝使用的葬具为黄肠题凑,皇帝出巡行驶的道路为驰道等。而除皇帝本人外其他人如果不是因封赐而违制,都会受到严厉惩罚。这也是为凸显出皇家天威和皇帝神圣至尊的地位。随着皇权巩固的同时与皇帝本身关系密切的宗亲、外戚、宦官、朝臣在皇权形成的过程中也发展壮大,形成一种与皇权相悖的离心力。此外,外族入侵,民间豪族、游侠、流民也逐渐形成一股势力,与皇权相博弈。因此,统治者为了谋求帝国的稳定,有时也会使用变态手段作为加强皇权的助推力。所谓变态手段,就是不同寻常的政治形式维护皇权统治。它往往是皇帝独创,具有阶段性,影响较深,效果显著且操作性强。秦汉时期的巫术政治、明代厂卫制、清代文字狱都是皇权运作中的一种变态现象。这些强化皇权的手段虽在历史上不占主流,

但在当时确实引起强烈反响,诱发政治变局。最主要的是不仅成功维护了皇帝在帝国的统治而且同时起到了一种震慑作用。

汉代作为古代中国帝制王朝的起始阶段,皇权初具规模。高祖刘邦由市井小吏一跃成为汉帝国开国皇帝,朝廷多为布衣将相之局。王朝初立,朝堂之上“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17]584}。为构建皇权威仪,高祖首先采纳了秦廷博士叔孙通博采旧例与秦仪为汉廷制定的仪礼规范,使得“自诸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高祖自己也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7]585}。其次,承袭秦制,继承秦代三公九卿官僚制度;最后,吸取亡秦教训,分封刘氏宗亲,行郡国并行制,以期达到拱卫朝廷的目的。他将建汉前初封的臧荼、韩信、彭越、英布、韩王信、卢绾等诸侯王势力先后铲除并举行白马盟誓,规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17]85}。刘邦的这些举措对有汉一代皇权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文、景时期,进一步加强皇权统治,面对同姓诸侯王势力壮大,文帝接受贾谊提出的“以皇权为中心的治安策”^{[18]192},限制诸侯王权力,景帝听取晁错的削藩策,通过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成功巩固皇权权威。正因为此,在继任的具有非凡魄力的汉武帝时代,皇权达到极盛。

汉武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统治西汉达54年之久。他以殚谋戮力的统御、独具胆识的谋略、锐意进取的改革,使汉帝国第一次出现在世界舞台,并与罗马帝国成为世界两大文明的中心,被誉为“功至著”的汉家天子,“冠于百王”的千古一帝^[19]。在构建皇权政治中,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建立中朝官以分散相权,设刺史和司隶校尉以加强对地方控制;颁布推恩令,制定《左官律》《附益之法》和酎金夺侯解决诸侯王割据;重用酷吏,打击豪右;经济上,实行盐铁专卖、统一铸币,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控制帝国财权;文化上,独尊儒术,立太学统一学术思想;军事上,改革军制,平定匈奴,征讨四夷,维护统一。然而“行政运作中有常、有变、有经、有权。为求运作合理的稳定和一致,需要持经守常,又不得不允许权宜变通。”^{[20]380}在使用常态政治统御措施的同时,对于政治嗅觉敏锐的汉武帝来说,将此时民间、宫廷广为信仰流传的巫蛊术作为一种变态行政方式无疑是加强皇权统治有效手段。

除了皇权的初具规模,汉代亦是中国神、仙思想充分发展的时期。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汉代精神与信仰世界时说:“若两汉,固仍一鬼神术数之世界也。”^{[21]810}鲁迅先生也说:“大畅巫风,鬼道愈炽。”^{[22]39}而武帝一朝,巫蛊之术影响尤大。巫蛊是一种让人恐惧的术数。王子今先生认为:巫蛊本是以民间风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说文·虫部》云:“蛊,腹中虫也。”《春秋·左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蛊”的原义,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汉代流行的巫蛊形式,是将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然后在桐木人上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企图使对方罹祸^[5]。邓启耀指出,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做法为诅咒后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1]70}。

巫术作为汉代国家信仰对社会影响深远,宫廷设有巫官和巫祠。“长安置祠祝官、女巫。”^{[17]169}“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17]102}在信仰的同时巫术也具有威慑力,令人畏惧。汉武帝时期的巫多为胡巫,在汉匈紧张敌对的局势下,匈奴在对汉作战时常以巫术祝诅汉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23]1126}而这种诅咒确实引发汉军中瘟疫的流行。也就是说,巫蛊是人之所为,属于一种可操作的“技术”。正是这种使人既信仰又恐惧的特殊力量,使得权臣相争,宫廷政变、家族较量常以巫蛊之术为契机、为法宝,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为汉武帝利用巫术构建皇权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理论基础。

汉武帝三次巫蛊之术的利用,也是皇权构建的过程。元光五年巫蛊案多是武帝集权思想的体现。针对三公九卿的权大,从而设立中朝官,形成只听命于己且政治根基浅的官吏组成决策机构来为皇权服务。征和二年巫蛊案体现了武帝保持皇权稳固、不容挑战的理念。通过任贤政策,建立新的选官制度和军事征服等系列政策,武帝皇权达到至尊,而依附其并受到重用的外戚势力也随皇权极度膨胀,甚至可与之相抗衡。这引发武帝对

于外戚政治的思考,即利用外戚间的矛盾,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同时减少对外戚的倚重,不委重职。征和三年巫蛊案则体现武帝追求皇权终身制的理想。晚年的武帝在对自己政治生涯的总结和反思后下轮台罪己诏,改变先前改弦更张的治国理念,变为守成守文。而对子嗣继承问题武帝也作了颇多思考,最终将幼子立为太子并行子贵母死制度,消灭所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巫术作为皇权政治中的变态手段,强有力地保持了皇权政治体系的稳定,推动汉武时代皇权走向鼎盛。

二、元光五年巫蛊案

汉代,崇尚孝道,外戚势力强大。汉武帝依赖外戚窦氏获得皇位,因而执政初期执行窦太后主张的“无为”治国理念,但随着窦氏势力的坐大,为保证皇权的权威性,最后借机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巫蛊案剪除窦氏集团。在利用巫蛊术清除窦氏势力过程中,武帝也开始逐步收揽和重用身边的心腹,最终形成中朝制度,进而架空以丞相为核心的外朝,实现巩固皇权的目的。

武帝即位之初,年龄尚小,资历尚浅,祖母窦氏掌握国家大权,凡国家之事,事无巨细均需向东宫太后奏请。窦氏受文帝、景帝时期思想的熏陶,崇尚因循无为的黄老之学,这与积极进取、欲有一番作为的少年天子大为迥异。经过高、惠、文、景七十余年的积累,“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7]182}面对天下富足、百姓安定,武帝认为应该一改前朝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国策,迫不及待的要内兴功业、外讨四夷。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任用窦婴为相、田蚡为太尉,下求贤良诏,将赵绾、王臧等儒士列为公卿,推行建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正律历、兴礼乐、行封禅的建元革新。然而黄老之学社会风尚的形成,并非朝令夕改之易事,加之窦太后是道家的极力推崇者和倡导者,此时仓促推行儒学兴国的政策触动了皇族贵戚和部分固守汉初无为政策的保守官员的利益。当年十月,赵绾又向武帝建议“毋奏事东宫”,本来已经不满改革的窦太后听闻消息即刻发动宫廷政变,使得推崇儒术改革的窦婴、田蚡免官,赵绾、王臧“皆下狱,自杀”^{[23]39}，“因废明堂事”“申公亦病免归”^{[23]880}。政治上的稚嫩,改革的冒进,仓促地行事,置时局于不顾最终导致登基不久的武帝皇权受到极大的威胁,从此制掣于东

宫太后,这给血气方刚的年轻武帝沉重一击。反思此时的政策,武帝最终只能采取隐忍不发韬光养晦的权宜之举。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后去世,武帝终于迎来乾纲独断、大展拳脚的机会。然而,窦氏一族经文、景、武三朝的积淀,势力盘根错节、骄横专权,一度威胁皇权统治,这让武帝不能释怀,借机陈皇后巫蛊案,彻底清洗了守旧势力。“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17]340}馆陶长公主的母亲是文帝的皇后窦氏,同时又是武帝的姑母、陈皇后的母亲。这种姻亲并不单是亲情血缘的世袭,更多带有政治色彩。这从武帝被立为太子,母亲王美人晋封为景帝皇后,以及后来陈阿娇得以顺利封后均能看出端倪。即在景帝朝时,窦王两家就一起联手打败政敌栗美人和太子刘荣。陈皇后最终藏于金屋,武帝顺利登位正是两家联结的产物。然而这股政治力量发展壮大直接威胁了皇权,最终被武帝借巫蛊之术彻底清洗。《史记》记载:陈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17]340}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引》:“《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诅咒,大逆无道。相连诸者三百人。’”这就是宫廷贵妇因嫉妒而使用的巫术。陈皇后巫蛊案并不是陈后本身有多大的罪孽,仅因妒忌使用巫术诅咒他人就遭到废黜未免太过严厉,而且是否她直接使用巫术也有待考证。这其中真正原因是对以陈皇后为纽带的窦氏家族势力展开的,武帝只是利用巫蛊这个外衣导演了巩固皇权,清理外戚、旧势力的大剧。

武帝初期,影响变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窦氏家族为核心的外戚势力,通过元光五年的巫蛊案,这股政治势力已经被武帝解决;另一个是以丞相为核心的朝臣势力。这些都和汉初的政策密切相关,西汉前期,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推行无为之策,这使得武帝的“有为”政策遭到保守贵族官僚的抵制。此外,汉承秦制,实行三公九卿。丞相辅佐皇帝,总管政务,在文武百官中权力最大,地位最尊,不仅百官恭谨从命,就是皇帝也要对其优礼相待^{[24]231}。这就给相权分割皇权提供了条件。窦婴、田蚡为相时,招客引士,随

意安插官吏,权移主上,汉武帝对此不甚满意。建元革新的失败,窦、王势力的强大,受制于窦后的惨痛经历,在陈后巫蛊案之后让汉武帝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拥有一套听命于己、受己所控的官僚体系极为重要。为巩固皇权,削夺相权,经过摸索,武帝实行中朝制度。逐渐提拔一批出身一般、有才干、多智谋的士人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并在左右”^{[25]232},从而形成了内外朝格局。内朝多为品级较低、谋略之士,成为皇帝的决策机构,讨论国家大事,直接听命于皇帝。外朝以丞相为首执行内朝决策,解决无关紧要的琐事。中朝官的设立不仅达到成功集权的效果,官吏从此只能配合皇权服务,同时也为之后开展“有为”政治、开疆扩土提供了保障。

武帝对元光五年陈皇后巫蛊案的巧妙运用以及设立中朝官制度,实际上是针对窦、王外戚势力以及信奉黄老之学、不谙变革的守旧势力的侧清,最终将大权集于一手。而对巫蛊术的运用则体现了武帝对皇权争夺及皇权至上原则的高明手腕。

三、征和二年巫蛊案

经过对守旧势力的侧清,武帝实行“有为”政治,提出唯才是举选官方针,笼络贤士为帝国政治服务,皇权力量得到空前发展。但原来武帝为平衡窦氏外戚势力而倚重的卫氏家族的实力逐渐增强,甚至已经达到威胁皇权的地步。更为重要的是,和卫氏家族关系密切的太子刘据政治理念和武帝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武帝认为皇权受到挑战,于是故技重施,利用征和二年巫蛊案(公元前91年)对卫氏家族势力进行打压,维护皇权至尊地位。

元朔年间,武帝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开拓帝业。然而想要实现政治抱负,就需要将天下能人贤士招揽于麾下,知人善任。“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23]48}武帝对于贤良“夙兴以求,夜寐以思”^{[23]40},当政几十年里,“畴咨海内,举其俊茂”“求之如弗没”^{[23]52},由此武帝提出任贤政策,唯才是举。首先,任贤不问出身,不拘小节。“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23]48}“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夫泛驾之马,跼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23]48}武帝认为人才也是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往往处事不寻常理,不同世俗。其次,选贤不避亲。任用外戚卫青、霍去病为将,征

讨匈奴,李广利征讨大宛。最后,实行察举制,一是命地方推举忠孝清廉之人,二是命两千石以上官员向朝廷推荐官吏。任贤政策保证中央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一时“群士慕向,异人并出”^{[23]592}。“天下布衣各励志竭精以赴阙廷自炫粥者不可胜数。”^{[23]672}张汤、东方朔、桑弘羊、司马相如、主父偃、严助、卜式等能人巧士的聚集,使武帝周围形成高智囊集团,对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正是任贤政策,支持了武帝对帝国的政治构想,在历史上留下彪炳千秋的一页。

唯才是举的政策,收益显著,且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提拔的官员绝对听命于己、忠心不二;其二,身份地位多卑微、低贱。这其实也是出于维护皇权不受威胁的考虑。但唯才是举同时势必导致官僚队伍壮大,形成集团化,特别是武帝“有为”政治中极为倚重的以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为代表的卫氏外戚集团,权力迅速膨胀,关系密布朝野。“卫皇后字子夫,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既饮,讴者进,上望见,独说卫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复幸,遂有身,尊宠日隆。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为侍中。而子夫后大幸,有宠,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据。”^{[23]340}卫子夫出身贫寒,没有专横跋扈的性格,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称赞她“嘉夫德若斯”。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后枝属为五侯。”^{[23]654}其家族特别是卫青、霍去病更是凭借“北登阏颜、饮马瀚海”出击匈奴的赫赫战功,使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23]651}成为汉军最高统帅,掌握军权。经数十年的发展,卫氏一族的声名贵震四海,“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17]341}卫皇后姊妹“孺为太仆公孙贺妻”^{[17]647}“后八岁(太初二年即公元前103年),以太仆为丞相”^{[17]652};“少儿故与陈掌通,上召贵掌”^{[17]647},陈掌乃开国功臣陈平之曾孙,后拜为詹事;“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17]341}这一系列的联姻,又使卫氏家族与外朝势力、内宫势力、宗亲势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周围聚拢了一大批幕僚门客,可以说是如虎添翼,连淮南王刘安企图谋反之时也很忌惮卫青威名。“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17]690}虽说卫氏家族大都奉法遵职,为人如履薄冰、谦虚谨慎,“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

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17]690}但不免树大招风,武帝对此已有芥蒂,甚少宠幸皇后、闲置卫青数十年之久,并采取“以霍制卫”的策略。但在立太子封三子的问题上,一向不过多参与朝政的霍去病却数次带领百官联名上表请奏,“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日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17]384}最终促成诸子外封为王,成功巩固卫太子地位,武帝以霍制卫计划宣告破产。最终伴随霍、卫的相继去世,卫氏家族在征和二年巫蛊案中基本覆灭。

巫蛊案首先是以卫皇后大姐夫丞相公孙贺家族为发端的。“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23]660}这次巫蛊案使公孙贺一族、阳石公主、诸邑公主(武帝女)、卫伉(卫青长子)均下狱自杀。这些均是卫氏集团的中心人物,但没有牵连卫氏核心人物。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将祸水引向太子和皇后。“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23]623}此时武帝避暑于甘泉宫,太子不得白于武帝,情急之下“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死者数万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杀。”^{[23]51}

此次巫蛊案是针对卫氏一族展开的。卫氏家族的卫青、霍去病、卫太子和皇后都是武帝开疆拓土、锐意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一改汉匈局势,使匈奴远遁漠北,长安不受甘泉之警,这对巩固边关、稳定四海做出卓越贡献。而对于太子,武帝最初也是给予厚望,大力培养。“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谋,使东方朔、枚皋作谋祝。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23]623}但随着卫氏的坐大,围绕卫、霍形成了庞大的军功集团,甚至宗室如刘安、文官如主父偃“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17]656}游侠如郭解“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17]724}都和卫氏一族有着微妙的关连,这让汉武帝极为担忧。加上此时卫太子刘据,其一,“性

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26]726}即性格谋略不像武帝张扬;其二,“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又“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26]727},即守文势力的依附,深得民心的措施令武帝不悦,长此以往与武帝渐生间隙;其三,统治策略和武帝不尽相同。太子刘据从小受儒家的正统教育,“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23]623}而太傅石德,又是汉初黄老思想推崇者石奋之孙,使得太子深受儒道两家观念影响,治国相比武帝的改弦更张、开边兴利更倾向于以德治国、不施兵威,为武帝所不忍。基于卫氏坐大、太子不类己,最终武帝借巫蛊之术铲除其势。

四、征和三年巫蛊案

从元光年间以来的开边兴利,国家积贫积弱,文景时期积累的粮食和殷实的国库已挥之殆尽。虽然武帝任用桑弘羊在不太多增加农民赋税负担的情况下施行盐铁、平准、均输的经济政策,来满足浩繁的财政需求,但“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贰师将军征大宛,天下奉其役连年”^{[23]251},导致“海内虚耗”^{[23]57}“天下骚动”^{[23]611}。连年的征伐,造成时局动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出现二百万的流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又爆发多地、多起的农民起义。雪上加霜的是,征和二年爆发的巫蛊案,牵连数万人丧命黄泉,其中不乏国家高级官吏,造成朝内无可用品之材,使得武帝不得不提拔田千秋这种低级官吏为相并封为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寻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23]661}征和二年爆发的巫蛊之祸,给帝国造成深远影响,武帝做出深刻反思,停止对外征伐,减轻赋税徭役,恢复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国策,下诏罪己,扭转了动荡局势。同时针对李氏、赵氏外戚集团的蠢蠢欲动,武帝意识到此时他已经走向人生的尽头,面对后继未定,再次利用巫蛊术,保证皇权稳固和顺利继承。

汉武帝晚年,为制衡卫氏外戚势力,提拔了新的外戚李、赵两族。但随着他们势力的发展,同样对皇权造成一种离心力。卫皇后巫蛊案后,太子自杀,于是李氏集团开始伺机谋划册立太子,他们企图谋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其明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

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23]661}而赵氏家族为首的钩弋夫人,为武帝出巡河间时所幸,是后来昭帝之母。“武帝巡狩过河间,忘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由是得幸。”^{[23]987}赵婕妤家族根基较浅,父亲当时已经去世,其父生前曾犯法被处以宫刑,做了宦官,任中黄门。“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23]987}基于此,钩弋夫人多拉拢身边的黄门、内者,苏文、郭穰便是其中较著者。苏文是谋划卫氏巫蛊案中的关键人物,面对李氏家族的谋立行为,以郭穰为代表的赵氏集团依靠武帝又掀起了一次巫蛊案,并且一剑封喉。“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23]662}

刘屈鼂巫蛊案是以郭穰为始作俑者的赵氏集团在汉武帝默许下针对李氏集团企图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而展开的阴谋活动,但真正的幕后操盘手是武帝本人,目的是为刘弗陵成为太子扫清障碍。刘屈鼂巫蛊案后,赵婕妤母以子贵。“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23]987}尧是上古德高望重的君主,将钩弋门命名为尧母门,这一举措预示着武帝对于太子册立的意图。而此时武帝对于其他诸子采取的行动更加证明了刘弗陵太子地位的不容置疑,《汉书》载:“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武帝由是恶旦。……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23]625}卫皇后巫蛊案中太子刘据败,其余诸子齐怀王刘闳早薨,燕王刘旦因请求入京宿卫下狱死,广陵厉王刘胥背负好娼淫乐的名声而不得为嗣。昌邑王刘髆也随着李氏家族的覆灭,丧失了继承权,并于武帝驾崩前一年去世,死因也有诸多疑点。不仅如此,“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

劾奏吉。”^{[23]987} 皇曾孙是卫太子的唯一后代,武帝命郭穰尽杀狱囚,是在为少子刘弗陵顺利登基做出的最后努力。纵观武帝五子的命运,早薨,自杀,下狱,这些都是武帝为少子登基而给其他诸子网罗的罪名,且《汉书》描述燕王旦“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23]625} 不乏博学多才,但武帝却厌恶之,不是武帝不明真相,只是为奠定巩固刘弗陵太子地位的不得已之举。而刘弗陵和武帝其他诸子相比年龄尚小,在武帝有生之年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集团,其母家也势力薄弱,易于掌控,但是子少母壮的经历让武帝最终实行了“立子杀母制”,这一制度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尔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17]342} 最终赵氏集团也因武帝唯恐母壮乱政而铲除其势。

征和三年的巫蛊案,先是利用李、赵两家的矛盾铲除李氏集团,最后又借子贵母死将赵氏集团驱之殆尽。任何外戚集团哪怕功业卓著也只是屈于皇权之下,外戚一时的专权,一方面也是皇权专制的把戏。立少子为储,未尝不是武帝追求皇权终身制原则的产物,子贵母死是保证皇权终身的最后努力。

五、结语

汉代鬼神思想盛行,巫术也不例外。民间多巫术,是大众的一种普遍信仰。巫术在武帝时期的广泛流行,有深层次的历史背景。首先,“长安置诸祠祝官、女巫。”^{[17]169} 国家以巫参与到祭祀活动,并形成制度化。其次,汉匈长时间的大规模征战,战争期间文化的广泛交流与融合,促进了胡巫对中原的渗入与传播。最后,京城长安是各种思想文化交融荟萃之地,巫术自然也在这里广为流传。巫蛊术,又是一种恐怖的黑巫术,是通过在地下埋藏针刺的桐木人并施行恶语而加害仇敌的手段。统治者对此明令禁止。以巫蛊为手段的宫廷

斗争又称巫蛊之祸,是基于民间、宫闱对巫蛊排斥恐惧的心理而展开的,它往往最有威慑力,武帝正是利用这一点,在皇权中渗入巫术色彩:一是利用巫术本身特色;二是分散政敌、百姓的注意力,以期达到政治目的,集中皇权;三是巫术运用方便,见效快、影响深远。巫术渗透到权术之中是武帝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

外戚集团在汉代是影响朝廷的重要力量,武帝一朝也不乏重用外戚,且多出身卑贱,这和武帝不重出身,唯才是举的观念是分不开的。但对于外戚,武帝只是将其作为加强自己皇权的工具而已,这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其一,武帝并不真正信任或依靠任何一家,只是根据才能加以利用,最终为自己所用。窦婴、田蚡、卫青、霍去病都担任过文、武最高长官的丞相和大司马,为武帝政治改革、征讨四夷做出重大贡献,但当他们家族坐大后,又提拔新外戚翦灭其势。其二,武帝并不真正宠爱任一后宫,金屋藏娇的陈后最后被幽禁长门,温婉清丽的卫后则因巫蛊案自杀;独特奇异的赵婕妤也因子少母壮赐死云阳。哪怕曾经万千宠爱、哪怕血浓于水,骨肉至亲,为了皇权巩固也不惜牺牲。制造巫蛊的武帝,宁可错杀亲人骨肉,也不能使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不是不明真相,而是皇权至上。此外,每次巫蛊案前后,都伴随着武帝加强皇权政治的其他辅助政策,从武帝初年建立内朝以制衡外朝的相权到晚年以子贵母死来为昭帝的即位铺路。这些措施成功的维护了皇权统治,也使武帝一朝成为汉代皇权最巩固的时期。

综上,武帝朝的三次巫蛊案,更多体现为一种外戚与皇权的政治博弈过程,该时期政局的跌宕起伏变化和此密切相关。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可以看到西汉社会信仰对国家政治所施加的影响。巫蛊之术作为一种社会信仰在武帝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体现为巫蛊充当了平衡皇权与外戚集团、皇权与官僚集团势力的一个政治工具或者说一种权变之法,使皇权在与各个政治集团周旋的过程中始终能保持大权在握的独尊地位。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政治的关系,更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特色所在。

参考文献:

- [1] 邓启耀. 中国巫蛊考察[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 [2] 李零. 中国方术考[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3] 宋兆麟. 术与巫术[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 [4] 胡新生. 中国古代巫术[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 [5] 王子今. 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J]. 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10-14.
- [6] 方诗铭. 西汉武帝晚期的“巫蛊之祸”及其前后——兼论玉门汉简汉武帝遗诏[J]. 上海博物馆集刊,1987(4):357-369.
- [7] 蒲慕洲. 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J].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87(第57本第3分).
- [8] 徐卫民,刘江伟. 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6-22.
- [9] 雷戈. 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0] 朱子彦. 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1] 邢义田. 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2] 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3] 宁可,蒋福亚. 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与忠君观念[J]. 历史研究,1994(2):79-95.
- [14] 李治安. 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复合建构[J]. 史学月刊,2011(3):28-31.
- [15] 王瑞来. 再论皇权[J]. 史学集刊,2010(1):3-25.
- [16] 栾保群. 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J]. 天津师院学报,1981(3):41-46.
- [1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8]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19] 安作璋、刘德增. 论汉武帝[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11-21.
- [20] 邢义田. 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1] 吕思勉. 秦汉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济南:齐鲁书社,1997.
- [23]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4] 安作璋,熊德基. 秦汉官制史稿[M]. 济南:齐鲁书社,2007.
- [25] 祝总斌.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26]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From Witchcraft to Look Political Expediency of Emperor HAN WU

HOU Yuet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infiltration of witchcraft is the one big characteristic of Emperor Han Wu political expediency. Outbreak of three times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Han Wu, Wu method of case is not accidental, is carefully planned family battle, political struggle. As Emperor Han Wu period of big events that result in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various political groups at that time the internal power struggle,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imperial power of emperor Han Wu of contingency. Witchcraft is just the coat to witchcraft this frightening, sensitive way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onsorts, courtiers and imperial power, is the imperial Emperor Han Wu political means of original. Using new consorts against the old mother to consolidate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lifetime of imperial power is the core of the imperial Emperor Han Wu politics. Through the use of Wu method of Emperor Han Wu also for the study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ocial belief and 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hip provides a view.

Keywords: Emperor Han Wu; imperial power; politics; Wu method; consort clan

(责任编辑:沈建新)